

■ 高端访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谈数字游民——

数字时代,如何呵护就业新形态

提要: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就业形态,不仅对促进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丰富了数字时代的产业形态。作为独特的人才资源,数字游民在小城镇和乡村居留,拉动了当地的消费,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呵护数字游民群体的健康发展,需要从制度、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等维度建立起良好生态。

■ 本报记者 周宇晗 张竟聪

当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社会的深刻转型,正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也冲击着传统的就业形态。其中,数字游民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群体。他们不受工作地点的束缚,通常从事创造性和趣味性工作,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追求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

数字游民为数字时代的就业拓展了想象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如何为数字游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这一群体成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本报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

就业形态的新定义

记者:请您谈谈,数字游民具备什么样的特征?这一群体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赵忠: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数字游民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数字”,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平台来工作,比如视频博主、远程教育、远程咨询、远程编程等,目前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服务业。二是“游民”,他们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强,工作和生活的地理位置是分开的,比如身处乡村可以完成来自城市的工作指令。除此之外,数字游民往往热爱旅行,倾向于探索不同的人文环境,对世界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比较自律,在工作上能自我监督;自理能力强,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

数字游民的出现,反映了数字时代对就业形态的重新定义。首先,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了数字产业发展,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人们以数字为业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深度变革引发了雇佣关系的转变。在劳动力的需求侧,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不断涌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对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在供给侧,各种数字化生产工具打破了许多就业岗位对时空的限制,使线上化、灵活化、零工化的劳动就业模式成为可能。第三,当代年轻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更加多元化,更追求精神

的富足和生活的品质。部分人群厌倦了大城市的“内卷”,每天通勤要花很多时间,生活成本高、买房定居不易,因此把工作转移到线上,到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借助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收入与生活成本差异,丰富人生体验。

记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英国的学者已经提出了“数字游民”的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数字游民发展趋势如何,与西方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赵忠:中西方的数字游民有共同特征,如个体流动性强、工作方式高度灵活、追求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等。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主要源于中西方迥异的文化背景。西方服务业发展早,很早就有自由职业文化,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体,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和雇佣关系,但进行的是远程工作。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中,稳定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安全感和保障。

近年来在线办公、视频会议、平台直播等新技术更加普及,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理念。数字游民“边工作边旅行、边学习边交友”的美好愿景,对年轻一代有很强的吸引力。2022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专门就数字时代的雇佣关系展开调研,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数字游民数量会显著增加。一方面,中国的需求市场大,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发展迅猛,新增就业机会很多。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风土人情不同,可以满足数字游民对旅居的需求。在欧洲,由于许多国家国土面积小,数字游民往往需要跨国流动,这会涉及工作签证、居留证等问题。而中国的数字游民目前主要是在国内的不同地区流动,更加方便。

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记者:在您看来,数字游民的壮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赵忠: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就业形态,首先对促进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特别是青年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数字游民,需要有创意、有想法,且掌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中,青年正互动交流。

许崧 供图

握互联网相关技能。这要求从业者持续学习行业前沿知识和最新技术,以便及时调整工作策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长远来看,这能使从业者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岗位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支持从业者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专业技能选择合适的工作岗位,有利于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工作时间相对自主,能够兼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保障生活质量,这也是就业“高质量”的一个方面。

第二,数字游民丰富了数字时代的产业形态。数字游民群体的壮大与技术进步是强相关的。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标准化生产不同,数字游民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多元化、定制化的,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对于强调人文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如视频、动画、游戏等,从业者体验越丰富的人文景观,越有可能提升生产力和产品质量。此外,越来越多来自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从业者也积极加入数字游民的行业。

第三,数字游民社区的形成,还可以拉动当地消费。数字游民平均收入水平较高,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与体验追求,可以提振当地的文旅、餐饮、住宿、租赁、体育等多领域消费。

第四,数字游民是一种独特的人才资源,在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把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优良、生活成本低的县城和乡村作为“栖息地”。他们

的理想、见识、资金、技术给当地产业发展和经营带来新机遇。比如,浙江省安吉县打造了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不仅使乡村闲置资源重新运转起来,还带动了乡村建设,落地了60多个新经济项目,形成“乡村+科技+文化”的复合业态。福建省屏南县策划推出“数字游民生活周”,在14天里开展120多场人文艺术、科学技术、手工技艺、乡野漫步等活动,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宣传了当地文化,推动了古村活化与文旅升温。

共建共享的新生态

记者:当前,数字游民发展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呵护数字游民群体的健康发展?

赵忠:劳动关系不明确会导致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不健全,这是数字游民,或者说所有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劳动者面临的共同难题。比如部分数字游民需要自己全额承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还不能自己缴纳。另外,“自由”与“高收入”背后,是对个人能力、资源和抗风险能力的高要求。由于工作机会不稳定、专业技能迭代快,他们普遍面临收入不稳定问题。

流动性强,也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提出了挑战。比如生活方面,房东能不能接受短租?社保能不能“随人走”,跨区域报销?子女的户口和教育问题怎么解

决?工作方面,数字游民高度依赖网络,旅居地能不能提供相对稳定的网络基础设施,技术设备出现问题后方不方便修理?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除此之外,数字游民还面临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当一个人的居留地点频繁更换,他的社会关系将面临持续的解构与重建。数字游民容易陷入“永恒的异乡人”状态:既无法融入当地社群,又与原本的社交网络逐渐脱节。这可能导致个体的孤独与焦虑。

数字游民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良好生态的构建。这个生态,我理解是三方面的。

一是制度的生态。必须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加快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在劳动关系界定上,探索更适用于灵活就业者的新标准,注意避免“数字过劳”等现象;在社会保障体制上,持续破解跨地域、多平台、间歇性工作参保续保难题;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款和行政法规,切实保护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实体的生态。小城市、县城和乡村要想把数字游民吸引过来,必须打造宜居宜业的环境。在呵护好生态和人文底蕴的同时,加快完善交通、邮电、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对新经济、新业态更加包容,引导其与当地的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为数字游民提供创新创业的空间。许多数字游民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久了,已经



专家简介:赵忠,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就业与民生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和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等。承担国家发展改革委、人社部、国家经济普查办公室、全国总工会、国家高端智库关于就业、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多项课题。

■ 纵横谈

数字游民,激活城乡活力的重要力量

■ 姚建华 谢炳文

在数字化浪潮与逆城市化趋势的交织下,“数字游民”正从一种小众的生活方式演变为青年就业的新形态。他们依托互联网,打破工作的时空界限,在流动中平衡生活与创造,既追求在美好地方生活的自由,也渴望与有趣的灵魂共创价值联结。

在这场就业形态变革中,浙江精准地捕捉到数字游民“流动中求创造”的核心诉求,充分发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优势,结合青年发展相关政策,积极开展数字游民发展路径的实践探索。从2021年12月湖州安吉启动数字游民公社的内测招募,到2024年12月丽水提出打造“数字游民旅居共创目的地”,再到2025年宁波上线以滨海乡村生活方式为特色的数字游民社区项目,浙江不断探索数字时代青年就业新形态。

把握核心特质

浙江在数字游民发展路径的探索中,始终立足于对该群体特质的精准理解。空间流动性与生态依赖性并存。数字游民多是厌倦城市“内卷”,向往自然与自由的城市青年群体。他们在选择旅居地时,既关注自然生态和人文氛围,也看重能否在舒适环境中高效工作。浙江各地利用自身生态优势,打造适合数字游民的工作生活场景。

职业灵活性与项目共创性需求共生。数字游民与居家远程工作者不同,他们并非单纯追求“不上班”的自由,而是渴望在流动中创造价值。其职业多集中在数字内容创作、AI创业、跨境电商等轻资产领域,这些领域不仅需要共享办公、项目对接等基础支持,更期待与当地资源相结合的共创机会。浙江各地根据

这一需求,积极搭建项目交流平台,推动数字游民与当地产业的深度融合。

个体独立性与社群归属感并重。数字游民看似分散独立,实则期待联结。他们通过兴趣社群,寻找志同道合者,碰撞创意,甚至形成项目合伙人关系。浙江各地积极构建多元化的社群空间,营造“独处不孤独、联结不束缚”的社群生态,为数字游民搭建交流平台,不仅促进了他们在情感上的连接,更促成了价值观念和创业实践上的深度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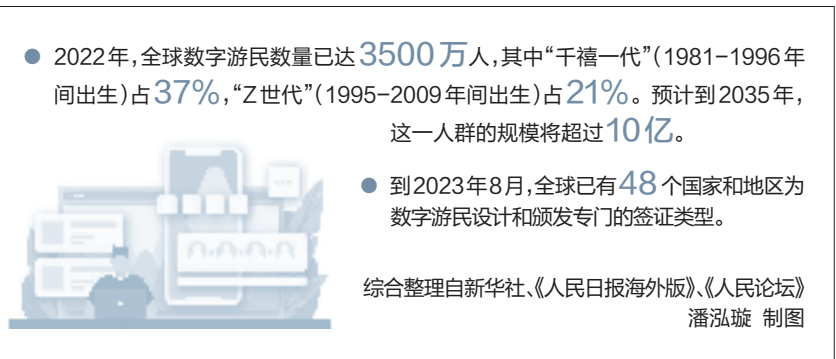
探索生态共创

浙江各地以社区为载体,在政策筑基、场景赋能、机制保障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推动数字游民社区从单一的“旅居空间”向多元的“共创生态”跃升。

在政策层面,浙江通过创新举措,打破传统户籍和创业门槛,为数字游民提供“轻量支持”。如丽水率先出台“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措施”,提供免费创业空间、项目资助和“一码畅游”等优惠。同时,上线“DN丽水”小程序,实现入驻预约和资源对接的“一站式服务”。这些政策基于丽水的生态和文化资源量身定制,吸引契合当地的数字游民,降低他们的创业门槛,促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场景层面,浙江各地依据地方特色打造生态复合型社区、产业联动型社区、文化跨界型社区等场景,适配数字游民的项目资助和“一码畅游”等优惠。同时,上线“DN丽水”小程序,实现入驻预约和资源对接的“一站式服务”。这些政策基于丽水的生态和文化资源量身定制,吸引契合当地的数字游民,降低他们的创业门槛,促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场景层面,浙江各地依据地方特色打造生态复合型社区、产业联动型社区、文化跨界型社区等场景,适配数字游民的项目资助和“一码畅游”等优惠。同时,上线“DN丽水”小程序,实现入驻预约和资源对接的“一站式服务”。这些政策基于丽水的生态和文化资源量身定制,吸引契合当地的数字游民,降低他们的创业门槛,促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景元素,并通过文化IP共创模式吸引设计师和艺术家,推动文化与创意产业融合,展现了文化跨界型场景的独特魅力。

在机制层面,浙江各地通过资源对接、社群自治、利益共享等机制推动社区从“人聚”到“业兴”的发展,实现从“物理聚集”到“共创联结”的生态转变。具体而言,资源对接机制是社区发展的基础,通过整合数字游民的技能与本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社群自治机制是社区发展的核心,通过成员的自主管理和参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可持续性。利益共享机制是社区发展的保障,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实现多方共赢。多种机制相互协同,不仅为数字游民提供了良好的旅居空间,更为他们创造了多元化的共创生态。

实现价值转化

浙江为数字游民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生态,实现了从“流量导入”到“价值转化”的发展转变,推动了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模式。

数字游民以个体创造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价值的持续提升。在丽水的数字游民社区和数字游民驿站,共创合作项目不断落地,“疗愈经济”“共居经济”“认

养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仅带动了乡村文旅、农创发展,还推动产业从“重资源”向“重设计”和“重体验”转型。

数字游民打破了过去城乡人才单向流动的困境,实现社会价值的活力迸发。在安吉余村数字游民社区,“原乡人”与“新乡人”携手推进乡村建设。电商直播、民宿、骑行、音乐演出等聚集了“人气”,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社区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数字游民以年轻化视角激活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价值的创新表达。在遂昌文旅驿站,数字游民运用数字思维对浙西南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生态资源进行创新诠释,设计出竹编小礼盒、陶瓷竹节杯等文创产品,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浙江的探索表明,吸引数字游民,尊重群体特质是前提,发挥区域生态和人文优势是基础,构建政策、场景、机制协同的复合生态是关键路径,而通过社区共创将“流量”转化为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则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浙江,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正从“旅居者”向“共创者”转变,成为激活城乡活力、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共青团丽水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

■ 我来讲故事

从“旷野人生”到“两山”转化

■ 许崧

数字游民这种生活形态为什么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可能是因为“带着电脑哪里都可以工作、都可以持续获得收入”的这种状态,恰好使得这几年流行起来的“旷野人生”具象化了,让很多自愿或者不得不离开“轨道人生”的年轻人有了一种新的人生选项。我的人生基本没有“在‘轨道’里待过。最早我在上海从事广告行业,收入不错,工作前景也很好。但2004年我和我太太分别辞了工作,原因还是那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用工作攒下来的积蓄开启全球旅行,踏上了我们的“旷野”。没有写字楼和琐碎牵绊,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只要 we 喜欢一个地方,打开背包就能住下。就这样走了全球40多个国家之后,2010年我们决定把家安在云南大理,这里是“中国数字游牧文化发源地”。在大理,我们找到了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东西,我把它叫作“持续稳定的满足感”。对我来说,把工位搬到大自然中,远离喧嚣和环境压力,对于以信息处理为核心本质的工种而言,不仅是个生产效率的提升,还有一个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跟人在一起,而不是跟一堆头街和标签在一起。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人际流动的信息范围和质量,影响到的是创新的发生率。大理是一个熟人社会,但不是封闭保守的传统熟人社会,开放性、多元性是它最大的特征。一群无须博弈而倾向于合作的人,一群背景极富多样性的人,在社区环境中形成广泛的信息交换,其结果就是创新不断发生。

2021年我们在安吉溪龙乡成立了安吉数字游民公社,我从数字游民转型成为数字游民创业者,很多人正是通过

我们才第一次知道“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建设数字游民社区这件事,有点像是在旷野中“点篝火”。旷野中的一堆篝火不仅能给到温暖,也让人觉得安全,自有漫游者会循着火光聚拢而来。原本可能没有缘分的人,因为一个火堆而变成朋友,变成知己,变成一起创业的伙伴,变成一世的爱人。在近四年时间里,从安吉的溪龙和天荒坪,到现在的黄山屯溪,有3000多名数字游民伙伴跟我们一起生活过。有些人跟我们相伴一路,变成一辈子都不要走散的挚友。

也正是因为有这群年轻人的聚集,乡村热闹了起来。长久以来乡村都是“落后”的代名词,以至于被标签化地印刻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其实中国的乡村已经经历了一轮巨大变化,公路通了,水网通了,网络通了,还有,更加绿水青山了,早已不是很多人默认的那种样子。但观念中的默认不容易改变,不假思索的“人往高处走”等同于“从乡村往城市走”,也使得很多乡村人口慢慢流失,渐渐失去了活力。因为有了数字游民公社,3000多名年轻人背着包抱着拉杆箱离开城市来到乡村,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画面,如今已是安吉和黄山

的日常。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年,很多人默认“绿水青山”是文旅资源,能引来游客和度假者,因而也就“金山银山”了。而从我们的视角,绿水青山的乡村环境能吸引来可以离开城市又随身带着工作的年轻人,激活了另一条“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我们亲历了很多神奇时刻,见证了无数创意的诞生,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作者为安吉数字游民公社、余村数字游民公社项目发起人 本报记者张竟聪整理)